

# 与帕斯卡尔逆道而行——代序

## 古典主义式的神童

以《思想录》一书在今天广为人知、写过基督教辩证论的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当然，所谓的写过，他并没有明确展示论证体系的结构，只将未刊的草稿留在了许多纸片上，而在三十九岁那年英年早逝，而又正因为英年早逝，更使得天才与夭折之间神话般的结合似乎获得了当然的证明的那个帕斯卡尔，据他姐姐吉尔贝特的回忆，从幼年期就开始，以“神童”特有的孤独加特权般的眼光，敏锐地对世界万象进行了解读。仅仅是十二岁的年龄，便独自沉醉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定理的证明，不到二十岁便发明了将欧洲自古一直沿用于货币单位的十二进制换算成十进制的计算器，受托利拆里“真空实验”的启发在大约三十岁前写出了《流体平衡论》的科学家帕斯卡尔，围绕着他所展开的各种故事，确实向我们鲜明地展示了一个“神童”所特有的青春轮廓。姐姐吉尔贝特称，帕斯卡尔的这种“科学”独创性的基础在于父亲艾基纳独特的教育方法，而其父是

所谓的“法袍贵族”，作为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期”以后的法国文化主要的实践者，可以说在将他们子弟的教育从中世纪经院哲学解放出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法袍贵族”的这种中间阶层所独特的异化意识的形态，在已有译介的吕西安·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山形赖洋译，社会思想社）一书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对于靠年金打发闲暇并对数学、音乐深入开展实证分析的父亲艾基纳来说，在以各种方式准备着或者说实践着尝试引导儿子布莱斯走进学问的时候，内心所体会到的，我想与其说是戈德曼所说的中间阶层异化意识，不如说必是那种攀附阶层上升气流所具有的“自由”的切身体验。

将少儿时期的布莱斯引入“实证科学”之门的艾基纳独有的教育方法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呢？姐姐吉尔贝特证实“弟弟从未上过学，除父亲以外也没有师从过任何人”。她如下描述其父对家里独子的教育：

教育孩子时父亲的基本思路总是更关注孩子而不是学习本身。因此在弟弟十二岁之前并没有进行拉丁语的教育，原因就是到了那个年龄学起来会很容易吧。

当然在这之前也并非放任自流，他把认为弟弟能懂的东西都讲了。父亲原理性地解释了各种国语乃为何物，这些国语根据怎样的特定准则被归纳为语法，这些准则中又如何有许多的例外，这些例外也都一一分门别类，并通过这种方法，能够使得所有的国语，从一国沟通到另一国成为了可能。这种原理性的解释使弟弟的思考变得明澈，使他理解了语法规则的存在理由。到了终于要学语法的阶段，弟弟已经懂得了学语法的意义，并在最应该下功夫的地

方确实实实在地下了功夫。(《帕斯卡尔》，前田阳一译，中公新书。黑体字为引用者所强调)

学生时代选前田阳一教授的帕斯卡尔讨论课时接触到的这一段，由于为此处引用的“原理性地解释了各种国语乃为何物”所震动而一直记忆犹新，而这一令人记忆犹新的教育方法又生动地突现了几个要点。首先是其父有意推迟了当时意味着学问的拉丁语教育，其次是解释了几种国语的原理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对照，最后是通过语法规则存在理由的教育使孩子事先弄通了问题的所在。其中第一点，即拉丁语教育的新时机问题，如果考虑到当时是第一部法语哲学著作即鲁纳·笛卡儿的《方法序说》面世的十七世纪前半期，则似乎可以理解为对拉丁语万能的经院哲学式教育方法的一种颇有制度意义的反抗。那是一个从政治的角度尝试设立各种制度性机构的时代，作为确立绝对主义王权的一环，诸如以净化法语精练法语为目的的法兰西学院这样的机构已是十月怀胎，正是由于这一点，对于那些试图从当下的事态中获取逼近理想未来之契机的革新观点持有者来讲，这或许反而是一种极为“自然”的“历史”的姿态。但是，余下两点，也就是语言的“原理性概念”以及“语法规则”问题，与其说是明确突现时代特点的“历史”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对普遍性、语言教育原理问题进行阐释之上的、在今天也可以就其妥切性进行讨论的“非历史”的东西。事实上，前田教授也曾表明过带有价值倾向性的判断：“与蒙田父亲在孩子出生后马上刻意营造拉丁语环境使孩子像学母语一样学习拉丁语的教育方法相比，学习方法本身很难说得上是更好。”而从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笔者自己的体会看，其问题的非历史性甚至可以这样表

达,即,即使在现代日本这样的一个特殊文化环境中,这一问题也能够成为评判的对象。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一国国语的学习,是把个体投放于一种非意识的语言体系环境中,还是有意地使之与差异的格序去较劲,两种方法到底孰优孰劣。而这一问题,对于拥有一个偶尔因为母亲是外国人因此日常生活中命定必然使用两种语言的孩子的父亲也就是笔者自己来说,在孩子正欲兴致勃勃地体验其语言生活的时候,帕斯卡尔父亲的“语言的原理性概念”、“语法的规则性”之类的问题,不断地冲击着笔者的思想,尤其面对的是一个处在以语言之砖敲世界之门时期的孩子。没有足够的收入能够保证有足够的空闲用于孩子的教育,面对已经很能干地区分使用法语与日语的孩子,是否应该在某个时候系统地教授“语言的原理性概念”和“语法的规则性”呢,或者说这一时期已经错过了也未必。而在制度性的教育机构中已经体验了两所法国幼儿园和两所日本幼儿园的孩子,从幼小时期开始就业已有了多位“父亲以外的教师”,三年前的四月以来更是在日本的小学与更多的教师开始了接触。虽然并无要培养成二十世纪帕斯卡尔的决心,仅仅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总想以某种形式为使孩子拥有两种母语而负起责任,更由于知道了与孩子同样境遇的几个混血少男少女表现出了类似于语言障碍的例子,“语言的原理性概念”和“语法的规则性”这一帕斯卡尔的主题,在超越了语言学习的人格培养的问题层面上,越发变得不可回避了。

因此,并非因为情操教育这样的高尚的动机,仅仅是由于某种别的原因对床边放着的唱片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一岁刚过的孩子在高兴时大叫“奥迪伊特”,指着留声机的唱盘口中发出能分出音节的句子“奥迪伊特、奥莱、奥莱”,当明白这是模仿应被称作吾家公用语的法语“*le disque où il est ?*”的时候,处在同样情况下一定会说“唱片,在哪?”的父亲,情不自禁

地就想起了帕斯卡尔。被他说成是“奥迪伊特”的“le disque”，在日语里表达为“唱片”，他以为“奥莱、奥莱”就能充分表达了的东西在日语里用“哪里”两字来表述，对于以上的两点，是否应该选择某一时期从“语言的原理性概念”、“语法的规则性”的角度来讲解呢？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语言学习，与帕斯卡尔的方法显然背道而驰，更确切地说接近蒙田的方法，只是没有表现得那么彻底那么认真而已。现在九岁了，孩子记忆里已经全无大叫“奥迪伊特”时的痕迹，也当然知道了法语的“le disque”意味着“唱片”，已不再把“哪里”说成是“奥莱、奥莱”而是根据问句的语法规则发“où il-est ?”的音。更有甚者，根据身处的境遇，他还会巧妙地日语与法语分开使用，以不同的感叹词训斥他的父亲和母亲。也就是说，“原理性”与“规则性”已在两种语言上都为孩子所掌握，这一过程中他的旺盛的、更确切说是自然的好奇心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父亲的懒惰与无能。这一活生生的体验开始使得父亲放弃了把帕斯卡尔的语言学习方法当成一种固有的观念。但这决非是为了给懒惰找个台阶。并非如此。而是因为一种逐渐的感悟，即“语言的原理性”和“语法的规则性”实际上自身决非什么“原理”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反映了“法国十七世纪 + 古典主义”的语言概念。也就是说，感悟到了帕斯卡尔乃极其“古典主义式的神童”，亦乃为历史条件所决定了的“神童”，其所受的语言教育不能被看作是具有“普适意义”的。就这一点以后还会有详尽的论述，在此，让我们先一边回溯孩子的语言体验足迹，一边介绍他在法国幼儿园所经历的“口语”教育的几个片段。

## “七叶树下……”

首先简要地对孩子的语言环境作一介绍。他于昭和四十二年<sup>①</sup>年末出生于东京，直至目前，父母还是以法语为母语的母亲和以日语为母语的父親。两岁的前半年和五岁到六岁的一整年在法国度过，此外除约两年一次的暑假在欧洲度过外都居住在日本的首都。家中原则上只用法语。这仅是因为日本人父亲所说的法语偶然好于法国人母亲所说的日语。小学之前大约两岁半起，电视只收看早晨九点到十点的NHK第三频道低学年节目、傍晚五点开始的第八频道的儿童节目、以及六点开始的第三频道的汉语和西班牙语，其他节目由于父母的兴趣爱好以及与此相关的强制性的钢琴练习，都被划为了绝对的禁区（在巴黎的中国餐馆他自己曾惊诧于竟然能让对方听懂自己说的“你们好”，但直到今天词汇上却未见大的长进）。无兄弟姐妹亦无堂表兄弟，因此两岁半就被送进了幼儿园，在法国体验了两所，回日本后又进了一家与先前不同的幼儿园。对新环境的稍感不安的适应期在法国为两个月，回日本后约三个月，此阶段一过，在法国便是法语，在日本便是日语更强烈地支配起他的无意识的思维。自言自语时候的国语发生了转换，自己开始指定入睡前提“故事”的语言。刚刚九岁的现在，语言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和稠密，也更为自然地内化了日语式的思维，与母亲携手散步看见洋人会指着说“外国人”。他的辩解为，这是一种国粹主义式的反击，因为在法国幼儿园任你如何解释都被别人认定为“中国人”。孩子之间发生争吵语塞时蓦然想起的竟是法国时代的事情，于是“资本主义走狗”、“殖民主义走狗”的回骂让对方胆战心惊。从结论上讲，他深信自己是日本人，相比巴黎更爱东京，为此让母亲伤

心不已,但其理由也不过是因为觉得东京的电车系统比巴黎的地铁来得更为方便。“私铁”、“国铁”与“地铁”的“市内延伸”不就是东京才有的吗?猛然又问起“市内延伸”一词法语如何表达,让做父亲的丢了一次颜面,立马查《法和词典》,见到的是“(私铁等)~到市中心”译成了“pénétrer jusqu'au centre de la ville”,但这是“说明”而不是“翻译”。确实在巴黎,以前有一条“索线”国铁延伸到地铁线那里,而最近直达郊外的快速地铁也开始了延伸到了国铁,就此有过曾在某“周刊”上读过的记忆,但搜寻无果转而向夫人告急,回答竟是这样方便的单词法语中没有。如此这般便有了还是东京比巴黎更有意思的结论。父母两人各自都对孩子的反应有各自的不满,然而只要找不到“市内延伸”这个咒语般的对应词汇,便无法促使他改变自己的观点。孩子于是以一种获胜的神情,先从口中发出那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日语“怎么滴”,然后又向母亲添加了一句“Tu vois!”。

总之,孩子的头脑中有一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迥然不同的词典,经常不得不惊诧于他的无意识所操作的解读板的构造。比如英语的“because”对应的法语有“car”和“parce que”两个,一般人都会译成“因为”或是“由于”,但从孩子的解读板弹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表达。对他来说,“parce que”的日语翻译应是“不是吗”和“你要知道”。想来也有道理。日常会话中问到“为什么”,人们总是回答“你要知道”。在大学法语课上尝试过小小的实验,结果验证了孩子的正确。问初级语法刚学完的学生“parce que”的日语对应词应是什么,无论哪所学校的学生回答都是“因为”,而接着问“为什么 parce que 是因为”,听到的必然是那种“不是吗”,“我们是这样学的”,“你要知道,字典里是这样写的”的回答。当指出“你瞧”,“这不是吗”和“你要知道”才是“parce que”时,学生脸上的表情让你

油然感到仿佛是你让他们接触到了语言的神秘，而也恰是此时，满脸得意的背后却是法语教师痛感着自己的局限与无能。

虽然现在他确信了自己是说日语的日本人，但孩子在三岁半刚过才踏上法国的土地时，却是既非日本人也非法国人。他看上去是以旺盛的好奇心贪婪地接受外界的事与物，从不直接表现出自己的肢体语言上的拒绝与排斥，仿佛很顺利地溶化进了法国的新环境。但这样说仅仅是对孩子适应能力的某种盲目的乐观，实际上巴黎幼儿园是一个彻底封闭的世界，其中发生着什么基本不为当父母的所知。日本的学校建筑进入正门是校园广场，其后校舍排成 T 字型或 L 字型，与此相比，高高耸立俯瞰街道的法国学校犹如兵营或警局，冰冷的大门似乎将父母心理上的伴随也却之门外。然而实际上，日本学校开放式的空间，却是在其周围拉上了一张不可视的网，将孩子从社会、世界、大人那里隔开并遮蔽起来，而相反法国学校貌似冷酷地操作着父母与孩子的分离，但实际上却将孩子直接投入到了与大人相通的“社会”。因此彼处所强调的是孩子如何获得大人所应有的气质，孩子气的天真被排除在了人格赞赏的对象之外。在父母与孩子分离的瞬间，父母因之能安心地找回自己大人的时间，而享受不被孩子所打扰的一天。见了人自不在话下，即使见了同类也不狂吠的被调教好了的法国宠物犬看人时的那双抱怨的眼睛，法国孩子的眼睛恰似这样的宠物犬的表情。而从孩子一次也没有说过不想去幼儿园反而整天焦急地等待着上学的时间这一点来看，那被称为冷酷的环境对孩子来说却是很有趣的。在很偏远的十三区公立幼儿园和市中心六区的私立幼儿园，孩子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每天续写着上学故事。

那可能是孩子在幼儿园过了两个月时候的事。在某次晚餐的桌上，意外地听到了孩子的诗朗诵，感动之情油然而起。

他停下了用叉的手，把食指放在嘴上，打断了父母的对话，要求我们倾听之后，诗从口中朗朗响起：

Je me suis endormi,  
Sous un marronnier,  
Un moustique m'a piqué,  
Je ne dormirai plus,  
Sous un marronnier.  
睡在一棵  
七叶树下，  
被一只蚊子，叮了一口，  
于是再也没有了，  
七叶树下的睡眠。

他一口气朗诵完后又将手移到前额，加了一句“dans la tête”(在脑子里)，然后根据刚才的诗意，无声地、慢慢地模仿了一棵树、睡眠、文字叮咬手臂以及示意“不”的动作。以法语为母语的母亲，为这朗诵与表演几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对其深情的表演产生共鸣的父亲，也沉醉于一种深深的感动之中，直觉感到这首诗对孩子来说，会成为记忆中某种永不消逝的东西。孩子也同样感到了某种满足，然后继续他的晚餐。

这首诗并不蕴涵什么深意，而如果暂不去追问它是否可算做“诗”，那么朗诵中有几点颇值得注意。首先，除了相当于“七叶树下”的叠句的原文第二行和第五行外，此诗的音节都为六音节，构成了十二音节，即所谓亚历山大音调的基本单位，而十二音节是法国人认为最自然的节拍，与拉辛和高乃依古典剧的节拍相同。而我们日本人所熟悉的七五调却在今天的幼儿园或者小学低年级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知道这一点，

那么此处要求从小熟悉法语最自然节拍的做法自然引起我们的兴趣。在此过程中,很有趣的问题还涉及到了连音。语言并不还原为单词,而是作为一连串的声音,也就是表述来记忆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法语的学习包含了最复杂动词中的过去式和将来式。尤其是日常用语中常用的“复合过去式”,是通过将动词中特殊的代名动词“s’endormir”和一般他动词“piquer”的对比来讲解的。而且,将来式中的“单纯将来式”也是和“ne~plus”这样的特殊否定式一起使用的。“时态”的复杂与诗作为整体的构思的简单,刚好保持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或者说主题的简单,帮助着理解语法规则的复杂。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诗的背诵在此并非目的,而是要求孩子在头脑中重复一次,然后表演出相应的动作。因此这决非日本的“游戏”,而是要让孩子去认识日常生活中动作与语言节拍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最后的“再也没有了”,在胸前左右摇摆食指的动作,一如公园工作人员走近擅入草坪的小孩做出的那种否定表示。

语言在此与其说是作为一种不同意思的单词连接,不如说是作为动作与节拍的一气呵成而习得的,也可以说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组词形式渗透进孩子内心的。在此背诵的诗,没有丝毫的文学味,它既不是惟有大人才懂的文体,也不是专哄孩子的人造幼儿语,而是原模原样可以作为日常语来通用的东西。对比日本小学中的文章朗读,即使是那些原意以口语形式写成的句子,也会变成所谓的朗读式语调,这一点实是大有深意。一般认为,日语中存在着“口语”与“文语”两种系统的语法,但实际上“口语”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与“会话语”在体系上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因此问题的根本,最终在于“读法”与“写法”,而通过此处诗的分析,逐渐能得以澄清的便是,所

谓的“文语”与“口语”，都有可能从属于书写文字的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日语中的“会话语”，虽然形构着一种与“文语”和“口语”均不相同的第三体系，但它的形态既没有成为被描述的对象也没有成为被分析的样本，我们见证的只是，一种与任何一个制度性场合的教育都相去甚远的现状。

这些问题自然应该用更尖锐的视线作进一步的审视，而在此确凿无疑的是，法国的法语教育的第一步，是建立在“会话语”或者更严格地讲是语音连接的基础上的，而从“七叶树下”开始的这首五行诗正是揭示了这一点。当然，小学入学后法国的孩子也学写字，但他们学的并非是如此这般的字应该是如此这般的念法，而是如此这般的音应该是如此这般去拼写，这一顺序恰与如此这般的字应该如此这般地念的日本人来了个颠倒。对法国人来说，困难的并非是书写好了的字如何发音，而是嘴里发的音如何去写成文字。在法国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收到教育层次较低的人的信，一眼看去往往不知所云，但读出声后却会顿悟原意。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被称为“句法”的东西决然都是从属于“音声语言”的，所以文字表述从来也只不过是音声的影子而已。而或许又可以这样说，对于我们来讲，“西方”的意义便在于我们如何去感知文字仅是音声的影子这样一个语言的特性。这一点意义实为重大。若再作进一步的追问，问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可以从文艺领域中作为书写的“小说”一直被挤压到了口头与身体表达的“诗”和“戏剧”的边角，一直被蔑视、被蹂躏中，找到问题的答案。经常作为与资产阶级上升有关而谈论的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繁荣，首先是这样一个事件，即如果无视大革命以后中央集权的初等教育中写字法的普及便不能去解释，而更重要的是，“西方”只是在从现在算起的一个世纪前，才第一次知道了“写”这一语言的实践。固然，此前“诗”和“戏剧”也

是书写下来的,但那仅仅是作为表征“声音”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使用了“文字”而已。随着“小说”这一被挤压的领域的兴起,本仅有“表征”、“代理”意义的技术性“文字”,开始了奇妙的特立独行。而现在,“西方”面对“文字”的特立独行,尽显困惑与无奈,甚而蠢蠢欲动试图尝试否定性的摇撼。让我们来挖掘一下此处的深意。

## 超越美丽

虽然是以幼稚多变的方式,在法国,语言开始测量语言自身的距离与关系是在十七世纪,即古典主义时代的事。米歇尔·福柯的那部与其形容为美不如形容为痛快至极的《词与物》(渡边、佐佐木译,新潮社),详细地分析了思考确切感受到作为“表征—代理”的自身存在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福柯指出,语言与语言本身应该缔结的关系,从十六世纪特有的“注释”转换到了“批评”,但是语言只要是作为“表征”保证着自己的生存,“批评”就只能从被看作是“表征”的对象间关系的“真实”与“准确”这样一个角度去接近语言。换言之,语言其时不得已表露出一種局限,即被还原成“纯粹的功能、系统的整体”,而不能觉察到作为一个个单词表述的当下语言的“现时姿态”。语言在此种局限内保证自己生存之时,便生成了一个作为“批评”所应展开的特权地带,或者说型塑了一个所谓的“一般语法”的概念。1660年,标为《普遍唯理语法》的书,即所谓的“波尔·洛瓦雅尔语法”,便是一部反映了这样的思潮,同时基于“诸语言中存在着一一种可以明确地再构建的秩序”的思想展开的有关“说话技巧”的语法书。这是有关“音声语言”体系的规则,由此技巧的展现使得“语言”无限接近“逻辑学”,以至最后几乎从属于逻辑学。卷首介绍的帕斯卡尔父亲的语言

言观,即“语言的原理性概念”与“语法的规则性”,在这样极为特殊、具体的历史背景与思潮中,乃是最为合理的教育法,虽然如此,但正因其坚持着对语言的“表征性”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决不可能成为普遍意义的语言教育思想。作为“真理”探索的“哲学”、作为“神”之信仰的“宗教”,尤其是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没有这一“表征性”自然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因此,所谓的“西方”,正是这一“表征性思考”的总体,而且与此同时,正是在这“表征性思考”的崩溃过程中逐渐实现了“现代化”。换言之,自从语言同时表露“虚假与真实”并开始显示其存在,应作为西方本身而既在的“表象性”自身,便成为了尖锐的、同时又是击中要害的批判对象。

这比如深刻地反映为雅克·德里达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而展开的“文字学”构思的提出。如果说福柯的著作因为他的极具危险的痛快而提供了一个易读的错觉,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日文版题为《根源的彼岸》,足立和浩译,现代思潮社)则给人以几乎痛苦的晦涩难读的印象。就德里达来说,用极其程式般的归纳,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会话语言=声音”对“书写语言=文字”的压迫史。正如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日文版题为《语言学原论》,小林英夫译,岩波书店)的卷首明确指出“语言学”的对象仅限于“音声语言”那样,作为语言存在方式的“文字”一直被认为从属于“语音”。相对于“逻各斯”,“语音”也就是声音因其自身业已是“表征”,故而“字”也就是“书写文字”,就只能“是”“表征”的“表征”了。若极其简略地说,德里达的极为晦涩的语言策略便是一个将“文字语言”从“音声语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尝试。此处不能详述这一策略伴随了怎样巨大的艰辛,读者不妨参照笔者的雅克·德里达论(“叙事诗的梦想与欲望”,《认识型》,1977年1月号),而不

管怎么说,问题的认识对于我们这些以日语为母语听、说、读、写以及思考的人来说,必须说几乎超越了想象的可能。今天,由于西方对语言问题关注的高涨,日本也变得随处可见种种有关语言的言说,但如果只是简单地绕过这一超越我们体验与想象的西方“表征性批判”,进行“语言何谓”的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意义上的、亦或抽象意义上的发问,那就只能说是一种无意义的摆弄口舌。

这里提到的两位思想家当然并不共有同一种视角。如果说脱去了“表征”外衣的语言开始表露出其鲜活的表层,而对此西方仍然一直试图将视线偏离语言的无遮蔽的表情,于此感到焦躁不安的是米歇尔·福柯的话,德里达则是试图在对“文字”这一语言的崭新面貌显露出困惑的西方将其困惑借以科学的名义千方百计遮蔽起来的无意识行为里寻找到一个契机,以此拆解虚构的历史。但是,他们两人都明确意识到了“语言”的言说必然远远偏离“语言”的领域,都力图使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其过程中,作为体系的语言秩序乃是一种被非语言的东西肮脏地污染之物的事实,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同样难于否认。然而,举目当前喧嚣得纷纷扬扬的众多所谓的“日语论”,面对时下也确实显露出混乱困惑的日语,表现出的却是一种焦躁不安,并进而试图挺身而出,以准确的优美的词汇去消解之。一边是怀旧,认为日语曾经不是这般丑陋,战败后经历了汉字限制,结果落到了今天这样贫瘠的地步;另一边则是寻根,认为日语与外语相比决不低劣,而外语奇怪地成为了宠爱,相反日语则受到了歧视,究其根由则源自于我们对外国文化理解的不到位,到处都充斥着对真实的歪曲,而歪曲一旦澄清,日本人对本国语言的认识也会走上正道。这两种观点的携手,便产生出了一种对将来的认识,即,必须去寻找回失去了的优美,在准确的旗帜下再造日语。基于这一认

识,当下的日语被断定为失却准确的丑陋的畸形,仅是一种等待着矫正的谬误,是面对优美应予脱换下的难看的临时装束。

确实,这些“日语论者”的观点也有其自身的道理。我们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的语言体验是如此的贫乏,零星琐碎的无序到处被唱着颂歌。然而混乱并非因为借助秩序的整理以及将它纳入准确与美的系统就会消失。显然,即使语言具有将自身纳入其中的理想的秩序,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眼把握这一秩序的全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不断表露的语言的表层。而被认为是秩序的东西,仅仅是在局部的世界上看上去凝固起来的语言,也就是被称为习惯用法之物。而看上去似乎被收纳进了特定秩序中的习惯用法,对于那些共有这些用法的人来说,或许可以谈优美与准确。但在这一优美准确的背后,无分秒凝固的语言,却也奔流着无序的旋涡。对优美日语的眷恋,对准确日语的期待,只能是在佯装暂时忘却了关注凝固语言背后的视线之时才成为可能。而可怕的是,这一暂时佯装的忘却,却在一个时候转变成了真正的忘却。我们在言说“文化”时容易出现的错误是,把任何“文化”必然所附有的负面,比如被认作为丑陋、滑稽、贫乏、愚笨等的负面,处理为到了一定时间必然恢复常态的临时性谬误,看作是不久就会痊愈回归到有序的极短暂的混乱,然后将这些东西排除在视线之外。这种思想正等同于把不管是先天的还是一时的病人从人的范畴中排除出去,而只把健康的人看作是人的歧视者的思考。玩弄这种下意识歧视的人的思考,当然只能是流于抽象。本书提出的正是对当下遍野弥漫的以优美为名的抽象、以准确为名的抽象的一个批判。这一点若能对《反“日语论”》这一有些吓人的书名提供一丁点的辩解,便是作者的万幸。

当然,《反“日语论”》并不针对准确优美而彰扬错误丑陋。

问题的本质在于，围绕着语言展开思考者，应该禁止自身去在一个抽象的层面解释谈论优美的同时谈论丑陋，谈论准确的同时谈论错误。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周围裸露出表层的语言，在此时此刻，乃是一种超越了优美与丑陋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因此，本书下面展现的是一个与作为活生生现实存在的裸露了的表层所作的游戏。而这一游戏的架构要素，是一些摩擦与冲突。决讲不出优美准确的日语的内人、以日法双语为母语的孩子、以及由于家庭的必然和职业上的需要使用非母语的法语，而且教非母语的法语的作者之间所展开的日常碰撞与冲突。而作者在激起了自己悟性的几个语言“作品”，比如从日本的小说与法国的哲学思想中找到了这些碰撞和冲突的反射的影子。但是本书中的语言，并不期待被这反射所引导，迅速地穿越这此起彼伏的碰撞与冲突，在西方与日本的比较文明论的貌似当然的层次上尝试均衡的恢复。并非如此，而是突然去撞击语言自身存在的活生生的当下态势，同时自身也经受这一当下态势的突然撞击的洗礼，同时，持续地在语言的局限领域中漂流不定，无有止境地去深化与语言共生存的艰辛与惶惑。通过这样的方式，以语言言说语言，以自身去体验去挖掘既已为非语言之物所污染了的东西。所谓语言，从本质上说乃是某种不自然之物。为何会将此种不自然错觉为自然呢？如果说在曲折迂回越轨倒错中展现自身的《反“日语论”》有某种主题性的东西，那就必然是对一种堂而皇之地将自然与不自然进行置换的操作展开的解剖和追问。

### 【注释】

① 即 1967 年——译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日语论” / (日)莲实重彦著;贺晓星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4369-9

I. 反... II. ①莲...②贺... III. 日语—语言学  
IV. H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2479 号

反 = 日本语论(莲实 重彦著)

HAN NIHONGO-RON by Shigehiko Hasumi

Copyright © 1977 by Shigehiko Hasu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kuma Shobo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ikuma Shobo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登记号 图字: 10-2004-164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反“日语论”

作 者 (日)莲实重彦

译 者 贺晓星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1.ptt.js.cn)

[sales@press.nju.edu.cn](mailto: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70 千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7-305-04369-9/B·332

定 价 16.00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